

● 三国文化书系·学术丛书

刘伟航 著

三国伦理研究



巴蜀書

585

B82-0/2
L15

三国文化书系 · 学术丛书

三国伦理研究

刘伟航 著



巴蜀书社

中国 ·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伦理研究/刘伟航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2.9(三国文化书系·学术丛书)

ISBN 7-80659-377-2

I. 三... II. 刘...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2501 号

策划组稿 梅锦辉 黄云生 周道贵
责任编辑 黄云生
责任校对 李 嘉
封面设计 李文金

三国伦理研究

刘伟航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58275 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0 千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377-2/K·38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三国文化书系

总 序

余正松

三国文化（广义的）是由三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其在存续流播的一千多年中派生出来的若干文化现象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艺术、民俗、宗教、旅游和思想理念等诸多方面。三国文化不仅具有本源的历史性，同时具有时间的超越性、国界的跨越性、意蕴的现代性以及兼具学术的和实用的价值双重性等特点。

三国文化的主体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蜀汉文化。这种主体性，自《三国演义》成书流布以来，更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国人物的崇拜以蜀汉人物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最为突出；三国人文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刘备的仁信、孔明的忠智、关羽的节义、张飞的威猛等；三国遗迹的留存、三国旅游的黄金干线也以蜀汉人物活动的区域为最多、最集中。三国蜀汉的君信臣

序

忠、贵义重和等，被中外企业管理家们和商业经营家们奉为主臬，世界凡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便有关帝庙的设置和对关羽的崇信。中国古今关于蜀汉人物故事的戏剧、曲艺、影视及其他艺术创作也以其数量多、内容丰、流传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最为突出。……总之，三国文化自它诞生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其影响可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似乎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影响，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与之相匹！

对于三国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有创新意义的和高水平的成果。我院处在三国文化发祥地的四川和三国文化的源头、《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家乡南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勢，积极投身三国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我院三国文化研究的实力和成就。比如：

龙显昭教授在三国文化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论曹魏道教和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曾在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反响。他的《谯周传》（载巴蜀书社《四川思想家》）廓清了自晋朝以来流行的对谯周的一些偏颇之见，极大地提高了谯周的历史地位。1993年，他主持完成了院、市的重点课题《三国文化历史走向》并作为向陈寿诞辰一千七百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充）的献礼。这部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的著作受到了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原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刘乃和评价说：“《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是一本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文史著作”，“此书不但有在学术界的文史价值，而且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各阶层中有其实用性，是

一本好书。”该书曾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纯蛟长期以来对陈寿与《三国志》进行了系统的专门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这些成果主要研究了陈寿的生平和他的史学思想、《三国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三国文化的源流关系等，弥补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些空白点。不少论著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史研究动态》、《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评介、转载，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中华孔子学会编《国学通览》一书称：李纯蛟的《陈寿的人品与史学》开始涉及“前人极少论及”的“关于陈寿的历史观或史学思想”，并称李纯蛟的《三国志书名称谓考》《三国志札记驳论》及续篇等都是“值得一读的考辨之作”。由他研制的《陈寿万卷楼陈列方案》，也同样受到高度评价。被称赞是“研制者长期辛劳，深入考证的结晶，是成功之作，可列为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

关于三国文化和它的衍生文化现象，蔡东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中华孔子学会编《国学通览》称其“涉及《三国志》研究史上的一些主要问题”，“是近年来开拓的研究新领域之一”。他对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的三国人物关羽的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认真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他因此获得了教育部的专项资助，现已出版了他和青年学者文廷海的学术研究专著《关羽崇拜研究》。有关专家评论该书具有三大优点：一是“史”的意识自觉而鲜明，严谨求实，不发空论；二是史实考订颇见功力，全部论述都建立在对

文献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视野开阔，内容比较全面，从而使人们对关羽崇拜现象得到更加丰富的、立体化的认识。

此外，中青年学者刘伟航、夏志刚、周斌、文廷海等，也长期坚持从事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院专家学者们对陈寿及其《三国志》、《三国演义》和三国文化的源流关系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和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工作。他们不仅重视学术理论的研究，还把应用研究同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南充作为当今三国文化源头的地位，先后为1992年在绵阳市召开的全国旅游片区会议和1993年南充陈寿与《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以及四川大学已故著名教授缪钺等所确认，极大地提高了南充的知名度，对南充市旅游业的发展和招商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是与我院三国文化学者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我院的专家学者们还是恢复和重建陈寿万卷楼的首倡者之一，并担任了这一工程的顾问，自始至终全面参与了恢复重建的规划、设计、修建、陈列布展工作以及文字与壁画两个陈列方案的研制工作。万卷楼的恢复重建和陈列布展工作，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评价。1993年南充陈寿与《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参加了万卷楼的开馆典礼和参观了陈列展览后一致称赞说：这是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万卷楼自建成以来，迄今已接待了来自国内和海外的数十万名参观者，成为南充发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但是，此前我院的三国文化研究一直处于“分散游击”状态，没有相应的研究机构，这既影响了三国文化研究的鸿篇巨

制、精品力作的问世，又与三国文化研究基地建设的规制不相适应。2001年6月，我院利用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南充召开的大好机会，组建了四川师范学院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董保中教授亲自为中心揭牌。三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我院深入持久地研究三国文化奠定了组织基础，成为我院三国文化研究由“分散游击”到“集团作战”的转折点。同年底，学院就三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组织构建、运作方式和研究目标进行了认真研究，责成该中心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并尽快拿出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来。

现在，一年过去了，该中心所规划的《三国文化书系·学术丛书》首批四种终于付梓刊行了。首批学术专著包括龙显昭教授的《三国文化源流略论》、蔡东洲教授的《关羽崇拜研究》、李纯蛟教授的《三国志研究》、刘伟航教授的《三国伦理研究》。在此，我要对这些学术论著的问世表示祝贺，对几位辛勤耕耘的专家表示敬意。同时，衷心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认真落实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拟定的“十五”研究规划，把三国文化研究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完成一批学术精品，造就一支学术队伍，进一步展示我院在三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实力，更好地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2年7月19日

于四川师范学院

提 要

从汉末到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局部的统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动荡和整合。本书共分五章，前四章对此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观念——忠、孝、仁、义的基本内涵、社会影响、变衍等进行了考察；第五章则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将对三国伦理的探索延伸到两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在三国时期，忠的观念对人们的行为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社会上以忠为贵，以忠相劝励。以尽职尽责为忠，犯颜直谏为忠，不叛旧主及为主捐躯为忠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作用，二是统治者有意识的提倡。对“君仁臣忠”和审时度势两大观念的极度强调，使此期的忠不再有那么强烈的从一而终色彩。

孝可以说是此期保存得最完好、对人们行为影响最大的封建道德观念。元论从统治者的认识、提倡程度，还是从各阶层人们的具体做法；无论是“物养”还是“心养”，“生孝”还是“死

孝”，都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最为重大的变化，当是在玄学的影响下，行孝从重形式向重内容方向发展。

仁的观念及其政治外化形式——仁政的影响和作用，从总体上来说，不及忠、孝。但人们仍然对仁及仁政有着十分强烈的向往和呼唤。正是由于此，三国的创建者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时均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以力假仁”而霸的道路，并在政权建设上不同程度地推行了“仁政”。但与此同时，对权力的渴望，“权变”理论的诱导，也使得“仁”成为上层统治者们进行种种丑恶行为的遮羞布。

义作为种种封建伦理道德的规定性的集合，在三国时期也有着十分明确的内涵，并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人们在实际行为中均自觉和不自觉地去辨别大义和小义、正义与不义；去讲求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义，而以“春秋之义”——春秋政治理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仍然在此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同仁一样，借“义”以篡位、打击政敌等种种卑劣行为也屡有发生，这是时人感叹“仁义陆沉”的主要原因。

在第五章中，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看到孝在三国和两晋时期的影响；在《晋书》中知道东晋初期如何为重振儒学而进行的努力；而从中国历代对嵇绍——西晋末的一位不孝而忠的封建士大夫的评价中，则可以了解不同时代的忠孝观。

The Study on the Ethic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bstract

China was from unity to division, then from division to partial unity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s of moral principle and ethics had a great turbulence and integr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author has observed and studi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key ideas of moral principle and ethics, the basic connotation social influence and charge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first four chapters. The author has extended the study fields . studying the ethics through case study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to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y, even including the whole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st chapter.

The concept of loyalty still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s action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ople were proud of being loyalty or encouraged with being loyalty to each other. There was a general knowledge that the loyalty means doing his duty, voicing his outspo-

ken criticisms before the monarch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not betraying his old master and sacrificing his life for his master.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it? The first is the great inerti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ideas. The second is the conscious advocacy of the rulers. Because of the two big ideas of read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 and benevolent in doing their duty to their parents, its emphasis had shifted.

Filial piety, we may say, was the best - preserved and most - influenced feudal moral concept. Whether it was from the cognizance and advocating level of rulers or from the concrete ac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whether it was "substance cultivation" or "filial to dead ones", its showing was obvious. The greatest change of filial piety was the trend of emphasis on contents from emphasis on forms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metaphysics at that time.

In general, the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the political form of benevolence were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So Cao Cao, Sun Quan and Liu Bei founded Three Kingdoms all using the way of pretending benevolence by force to seek hegemony when they set up their kingdoms. And they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to build their state power in different degre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ulers longed for the power, and were tempted by the adaptability or flexibility in tactics. So the benevolence became a fig leaf which was used to veil their ugly actions.

Righteousness had a distinct connotation and was paid attention

• 4 • to and was respected. Peopl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distin-

guished the great righteousness from the little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from injustice in their action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ighteousness of monarch and minister, father and son, brothers, friends, husband and wife, the righteousnes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till had an important status. Its political ideas were used to guide people's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like benevolence, all kind of base conducts often happened such as usurping the throne and hitting political opponents. It wa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people who lived in their kingdoms signed the decline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 can see the inference of filial piety from Shi Shuo Xin Yu in Three Kingdoms and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and know the great effort how to restore Confucianism in Jin Shu (Book of Ji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understand the idea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n different times from the appraisal of Ji Shao who was a feudal literati who was loyal but not filial.

This book can b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book for the option cours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readers of high school level above.

前言

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当然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批判和继承。在有些人已经丢掉了本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的道德观念的今天，强调道德的重建，就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较为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仍然是很薄弱的，即使有那么一点探讨，也是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略为提及，真正独立的探索，当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了。

但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些研究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实际上走的仍然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老路子——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历史上的一个个思想家们。也就是说，人们主要是从这些思想家们的著作中，而不是从当时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探究整个社会的伦理思想的。而这样的研究，对于与当时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说，很明显是不够的。

从汉末到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局部的统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动荡和整合。因此，对此期伦理思想的研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而，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三国伦理的著作。在伦理学中，有关的研究则有如下数种：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①、陈瑛等著《中国伦理思想史》^②、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③、姜法曾《中国伦理学史略》^④、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⑤、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⑥、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⑦，等等。三国史的专著，则有马植杰《三国史》^⑧ 和何兹全《三国史》^⑨。

至于说到研究三国伦理问题的论文，数量也不太多，张大可在他的《三国史研究》^⑩ 一书中，对 1949—1987 年的三国史研究进行综述，其中没有“三国伦理”的项类。在后来的研究中，笔者所见明确研究三国伦理的论文，也仅有廖双初《谈刘备的仁义思想》和《刘备的忠君思想及其演变》^⑪、刘竟文《成于忠义，

①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年。

②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⑤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⑥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⑧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⑨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⑩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⑪ 益阳：益阳师专学报，1993 年第 2 期，1994 年第 2 期。

败于忠义：三国蜀国败亡原因探索》^①、李昱妓《论曹操的儒学伦理实践》^②等数篇。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论著涉及三国时期的伦理问题，如王大良在《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③一书的“王祥兄弟成名手段和在汉晋时期的周旋”、“琅邪王氏的家族结构与行为规范”、“琅邪王氏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传统”等节、目中，对琅邪王氏的伦理观作了个案分析。张大可在《三国史研究》中的《论曹操》、《论刘备》两篇论文中，也分别对曹、刘二人的道德观作了细致的探讨。不再赘述。

以上的研究，对笔者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总的说来，对三国伦理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看，都显得不够。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是：（1）伦理学史的研究，主要把焦点集中于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思想家们，故几乎所有的这方面著作讲到三国西晋时，都是用对玄学的分析来代替对伦理观念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阮籍、王弼、郭象、向秀等个别玄学人物的身上和一些玄学命题上，而忽视了三国社会中与伦理道德观念有联系的众多人物及其事迹；在研究方法上也只是从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从人们的行为去认识和总结当时的伦理观，使得这些研究略显片面和薄弱。（2）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伦理规则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在两本《三国史》专著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来探讨此问题；在论文方面，个案文章显得太少，更没有关于三国时期伦理道德研究的总论性文章。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忠、孝、仁、义等观念，在三国时期是怎样规范和影

① 上海：文汇报，2000年4月22日第12版。

② 郑州：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③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国伦理研究

响着人们的行为，时人是如何看待传统的伦理思想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哪些，三国时期的伦理思想的内涵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思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1）传统观点的影响。三国乱世，动荡不安，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导致兴趣的丧失。（2）三国断代的不确定性。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始于汉末，而三国的结束，又与西晋交错，在史料上难以取舍，从而给三国伦理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3）学科上的交叉，三国伦理研究，需要将史学和伦理学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有相当难度的。

下面对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略加说明。

第一，本书所说的“三国伦理”，其内容主要是研究探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忠、孝、仁、义四大观念。这不仅因为这四个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最早出现、影响最大，也是为了避免多生枝蔓。

第二，本书在时间断限上，采用传统的三国断代观点，即起止时间从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笔者采用这种断限，除了它本身符合三国历史实际外，更重要的是想解决在史料的使用上引起疑问的难题。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不再对三国时期的思想家们的观念作过多探讨（其思想请参见上面所列的有关前人成果），而主要从当时社会的各阶段中各阶层人们的言论、行为及制度等社会存在中，对当时的伦理观念进行归纳和分析。同时，此期伦理观念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其对社会政治、法律、军事、文化、